

一种关注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国产喜剧电影的走势与未来，也许就在这个春节档里

桂琳

作为中国商业电影的主打类型，喜剧电影的质量提高对中国商业电影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国产喜剧电影此起彼伏，逐渐形成以小投资博高票房的套路；而今年春节档，喜剧电影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整体水准很高。从中我们可以一探国产喜剧电影的走势和未来可能。

走势一：
多种喜剧资源的本土化改造与融合开花结果

对于多种喜剧资源的借鉴与融合，是近年来国产喜剧电影的一个鲜明特点。具体说来，包括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欧美资源；以周星驰电影为代表的中国香港资源；以及中国内地的网络文化、青年文化和草根文化资源。

2006年上映的宁浩的《疯狂的石头》，属于一、三两种资源结合的产物。它在情节上模仿《两杆大烟枪》，第一次将20世纪90年代才在欧美电影中流行起来的网状叙事引入中国当代喜剧电影创作，但其核心则是处理中国都市社会进入新世纪后的新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经验。

随着国产喜剧电影这些年的发

展，三种资源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很难做清晰的划分。今年春节档的《疯狂的外星人》将好莱坞外星人科幻电影情节与中国的城市小人物故事进行拼凑，同时又将民间的耍猴技艺、港式喜剧噱头、好莱坞大片奇观展示、内地流行文化等极其繁多的元素融合进主干故事和人物之中。《飞驰人生》则是将好莱坞落魄英雄形象、港式喜剧噱头和体育竞技类型的情节和动作元素融合在一起。相比之下，周星驰的《新喜剧之王》仅仅以旧作《喜剧之王》打底，在喜剧资源借鉴上相对单调，这也是它在吸引力上不如前两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走势二：
喜剧与多种类型嫁接，花样翻新各有亮点

从今年的春节档喜剧片来看，将喜剧与成熟类型嫁接，正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票房号召力。这种做法的一大好处是使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呈现出相对严谨的状态，十分重视笑点与情节、人物的结合，极大地保证了喜剧电影的质量。

宁浩喜剧就是一一直坚持这一路径，《疯狂的石头》嫁接的是后现代侠盗片，《心花路放》嫁接的是治愈式旅途片和男性情节剧，今年《疯狂的外星人》更是创造性地嫁接了科幻片。除宁浩作品之外，这些年产生的类型嫁接的喜剧佳片不少，如“囧”系列的治愈式旅途片、《缝纫机乐队》的现实主义电影、《煎饼侠》的漫威英雄片、《唐人街探案》的侦探片、《捉妖记》的神怪探险动画片等等。今年春节档的《飞驰人生》则是充分利用了体育竞技片的类型元素。

类型嫁接的同时，借助其它成熟类型的文化功能，也催生了与社会文化需求极其贴合的喜剧作品，甚至出现能够处理严肃文化问题的高级喜剧。比如“囧”系列借鉴治愈式旅途片的类型元素，展现人物在旅途中引发诸多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的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成为影片喜剧笑料的直接来源，影片还通过将正面价值观完全赋予了底层形象来批判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中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安抚这些欲望给个体带来的诸多焦虑。《心花路放》则是利用男性情节剧的类型元素十分准确地传达了当代社会中的性别冲突，承载着丰富的社会信息。

与此同时，类型嫁接使喜剧电影花样不断翻新，能够满足更多样化的受众需求。从今年春节档喜剧

电影就可以看出，喜剧电影数量虽多，但因为它们采取了不同的类型嫁接方式，几部喜剧电影并不雷同，而且各有其亮点。《飞驰人生》的亮点是借助体育竞技类型的激情与喜剧情感结合，带给观众双重的情感释放与满足；《新喜剧之王》则是将周星驰喜剧无厘头小人物刻画

的类型惯例进行翻新和改写，试图对小镇青年形象进行新的塑造，只可惜无厘头小人物的荒诞感在《新喜剧之王》中被放弃，可以说是丢掉了周星驰电影的灵魂所在，变成了一个略显平淡的故事加一个缺乏独特性的平凡小人物组合。

几部影片中，《疯狂的外星人》属于在类型嫁接上最有野心和创造性的。首先，它同时借用了好莱坞外星人科幻片的类型与反类型。好莱坞类型片本身有自己的发展过程，一种类型的发展往往经历建立、复杂化甚至到反类型的阶段，尤其是一些生命力长久、文化含义丰富的类型，比如西部片、侠盗片、科幻片等，都经历了走入反类型的阶段。《疯狂的外星人》便是将好莱坞外星人科幻片的类型与反类型元素同时嫁接到电影中，影片对外星人的态度十分暧昧，它与人类的关系既有斗争又有和解。外星人形象兼具正面与反面，成为复杂的形象。其次，以往国产喜剧电影对西方成熟类型的借用更多考虑的是文化的本土化问题，《疯狂的外星人》则试图借助类型嫁接来展示多种层面的文化碰撞，比如人类与异人类文明、中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以及当代文化的复杂内部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对这部影片的喜悦很难准确把握，导致观众口碑差异巨大。

走势三：
小人物作为喜剧的绝对主角，向广度和深度挺进

无论从哪里借鉴资源，这些年成功的国产喜剧电影都做了一件事：与本土文化资源结合。而小人物形象塑造正是本土文化资源进入喜剧的利器。从宁浩的前两部疯狂系列的命运来看，《石头》的成功和《赛车》的失败就是由小人物形象的塑造决定的。

在2019年的春节档喜剧中，小人物依然是喜剧电影的灵魂。《新喜剧之王》的如梦与《无名之辈》中的眼镜有些相似，也是一个到大城市打拼的小镇青年。这种巨大时空错位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很容易产生戏剧感，但可惜的是，如梦的形象缺乏立体感和深度，有些脸谱化。《飞驰人生》中的张弛则是被命运一再打击却坚持梦想的小人物形象。《疯狂的外星人》中的耿浩，因为影片本身复杂的文化表达，成为一个极复杂的小人物形象，不仅有草根

身份，同时也代表着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与西方文化的对抗，也有对人性弱点的隐含批评。

尽管褒贬不一，但总体而言，今年春节档最具代表性的喜剧电影是《疯狂的外星人》。它不仅展示了国产喜剧电影学习与借鉴成熟类型越来越大胆，融合各种喜剧资源越来越复杂，更是表达了将国产喜剧电影推向一种多层次喜剧的野心：从表层的精彩故事、噱头和奇观到内里的复杂文化表达，甚至开始进入到更深层的文化自省。以《疯狂的外星人》所代表的2019年春节档喜剧电影让我们看到国产喜剧电影的未来可能性，即进入历史、文化与哲理的深层次表达。至少在《疯狂的外星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野心和可能性所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疯狂的外星人》将外星人科幻电影情节与城市小人物故事进行拼凑；《飞驰人生》则将好莱坞落魄英雄形象、港式喜剧噱头和体育竞技类型的情节融合在一起；周星驰的《新喜剧之王》仅仅以旧作《喜剧人生》打底，这也是它在吸引力上不如前两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 | | |
|------------|----------|
| ① 《喜剧之王》 | ③ 《飞驰人生》 |
| ② 《疯狂的外星人》 | |

书间道

谈谈我心目中《飞鸟集》的两个经典译本

许钧

《飞鸟集》是我国最早译介的泰戈尔诗集，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泰戈尔的诗歌在中国精神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长为一棵葱郁的参天巨木。这棵葱郁巨木枝繁叶茂，已经生发出200多种不同译本，如今还在不断地生发出新的枝桠。读者对《飞鸟集》的喜爱和关注也丝毫不减，对原作有各自的解读，对译本也有着各种不同的评价。在众多译者与读者的心底，都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泰戈尔。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比史更真。历史是已然发生的事实的聚集，发生的事件会在时间之长河中消逝；而诗是情感思绪的表达，揭示人类命运的必然性和自我选择的可能性。有情方有诗，诗歌滋养人的心灵，导向生命的本真，祛除人在尘网中的荒凉感、孤独感，召唤我们去追求美，发现美，体悟永恒的美好。

《飞鸟集》正是这样一部传达真、善、美的诗集。在我看来，《飞鸟集》深受中国读者喜爱，其原因至少有二：

首先，诗集中以“飞鸟”为代表的诸多自然意象符合中国的传统审美观。“飞鸟”的意象，自《诗经》始，穿越了先秦、两汉乃至明清的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无论是屈原、阮籍，还是陶渊明、欧阳修，乃至当代中国的许多词曲作家和诗人，都爱寄情于飞鸟，借物咏怀，寄托理想、追求与抱负，寄托孤独、寂寞与彷徨。诚如逋钦立先生所感，飞鸟是自然的化身，亦与人的活动轨迹相似，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因此，飞鸟成为诗人内心世界的反映与诗人人生的象征。从古至今，无数文人雅士寄情飞鸟，感悟自然，以物言志，从而获得心灵的慰藉和思想的升华。同样，《飞鸟集》中的其他自然意象，如“流萤”“星云”“迷雾”“风雨”“落叶”等等，在中国诗史和文学史中都广泛存在，被国人广泛接受和喜爱。

其次，泰戈尔的《飞鸟集》拥有自身融通东西文化的独特之处。《飞鸟集》既符合东方文化“物我合一”“道法自然”的追求与意趣，又突显西方文化注重的人格的力量和人性本身的价值。《飞鸟集》共有325首短诗，内容丰富，句句是箴言，风格清新隽永。泰戈尔寄情于自然，寓情于景、于物，对宇宙、对世界、对人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可以说，他的这部《飞鸟集》是一部充满了对生命的体悟，充满了人生哲学的有温度的哲理诗集。泰戈尔以精妙的语言，纯净质朴的诗意文字，触及了人生的不同境遇，易于投射到读者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从而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震撼。泰戈尔的诗歌能够使人们获取情感的快乐和精神的愉悦，在残酷、乏味的现实中，更体现了人格的价值与人性的美感。郑振铎先生在1956年出版的《飞鸟集》新序中说：“泰戈尔的这些短诗，……往往在短短的几句诗里，包涵着深邃的大道理，或尖锐的讽刺语，……它们像山坡草地上的一丛丛野花，在早晨的太阳光下，纷纷地伸出头来。随你喜爱什么吧，那颜色和香味是多种多样的……那些诗，是带着很深刻的讽刺，甚至很大的悲愤的，更多的诗是洋溢着对人和自然的爱的，还有些诗是像‘格言’的，其中有不少是会令人讽吟有得的。”

《飞鸟集》最早的翻译者是郑振铎先生。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先驱，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郑振铎提出文学思想应破旧立新，文学应肩负新的使命与任务。因此，他积极译介异域的优秀文学，早在1921年，郑振铎就与王靖分别翻译过多首泰戈尔的诗。1922年，郑振铎选译的《飞鸟集》在中国问世，成为其追求思想解放与独立而进行的文学翻译创作活动的一次系统性尝试，为彼时寻求新文学、新思想的知识界播下了一颗饱含自由与爱的种子。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至今已有96年历史，一直长盛不衰，被视为经典之译作。《飞鸟集》所体现出来的对自然的崇尚、对宇宙的思辨、对人生的体悟，感动了一代代中国文学青年，也影响了不少历史上的名家，如刘半农、鲁迅、瞿秋白、

徐志摩、冰心等，郭沫若曾言“在我自己的作诗的经验上，是先受了泰戈尔诸人的影响力”。

《飞鸟集》的另一个具有特色的译本，出于姚华之手。姚华（1876—1930），字荏父，近现代学者，中国科举制度下的最后一代文人，工词曲，善书画，亦是刻铜大家，被誉为旷世奇才。郑振铎的译本问世后，“当时姚荏父先生见之，大为赞赏”，便在译文中选择了257首，改写为长短不一的五言诗，名曰《五言飞鸟集》，在徐志摩的推动下，于1931年由中华书局刊印发行。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在《五言飞鸟集》的序中记载了两人见面的情形：“那年泰戈尔先生和姚华先生见面时，这两位诗人，相视而笑，把彼此的忻慕都放在心里。”姚华在北京举办画会时，泰戈尔也欣然前往捧场，并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泰戈尔还把姚华的画带回印度，陈列在美术馆里。徐志摩感叹：“这是极妙的一段文学因缘。”

姚华先生的《五言飞鸟集》，正所谓“诗人译诗”，可谓将泰戈尔的《飞鸟集》中国化、本土化，用中国传统诗歌的体裁在郑振铎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二度创作，如“世情生处匿，相亲始见真。实际转么眇，罕譬求其伦。如古乐府辞，短歌能入神。未若芳泽下，一握复频频。”又如“飞鸟鸣窗前，飞来复飞去。红叶了无言，飞落何处？”姚华之译本的意译本身，掺杂着他本人对于泰戈尔所言之自然景物、人与生命等主题的深刻理解和微妙表达，“是更具有中国诗的风味了。”（参见郑振铎“新序”，《飞鸟集》，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1页）以中国传统的诗歌体裁演绎出的姚译本，也如泰戈尔诗篇一样，语言精练，清朗易懂，寓情于物，真善唯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诗以言志”的功能和汉语文言之美，可谓将印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一次大胆尝试。

两种不同风格的译本，白话文与中国传统五言诗体，一个直译，一个意译。从这些经典译本中，我们能够同时感受到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不同魅力。这一次，商务印书馆集两种各具个性的译文，重新推出《飞鸟集》，是希望为“误入尘网”的“羁鸟”与“迷途之鸟”指路，更希望向往自由的“飞鸟”，能够找到生命与精神的归守之所，在诗意人生中翱翔。

感谢泰戈尔，感谢《飞鸟集》，让我们能够暂时忘却人世间的喧嚣，倾听内心的呼唤，感受安宁，向往美好，获得自由飞翔的力量。

（作者为知名翻译家、浙江大学资深文科教授）

相关链接

郑振铎、姚华
《飞鸟集》翻译对比

郑振铎：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姚华：世情生处匿，相亲始见真。实际转么眇，罕譬求其伦。如古乐府辞，短歌能入神。未若芳泽下，一握复频频。

郑振铎：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姚华：飞鸟鸣窗前，飞来复飞去。红叶了无言，飞落何处？

郑振铎：如果当失落太阳时你流了泪，那么你也要失落群星了。（郑译通行本有改动：如果错过太阳时你流了泪，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

姚华：白日既西匿，众星相代明。如何偏闭眼，独自拥愁城。

郑振铎：“海水呀，你说的是什么？”“是永久的疑问。”“天空呀，你回答的话是什么？”“是永久的沉默。”

姚华：无住海潮音，日夜作疑语。问天何言答，默默与终古。

郑振铎：你看不见你的真相，你所见的，只是你的影子。

姚华：我身不自见，我见非真相。如将影悟身，谓身亦已妄。

郑振铎：蜜蜂从花中啜蜜，当离开时嗡嗡的道谢。浮夸的蝴蝶却相信花是应当向他道谢的。

姚华：蜂儿採蜜罢，小语颇营营。临行致其意，与花作谢声。蝶儿浮以夸，率然双袂举。固应花谢予，临去无一语。